

# “棟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朱志远

**内容提要** 曹寅以“棟亭图”遍征江南名家题咏，演为清初江南文坛盛事。进入文学史的“过程”来考察其内蕴有三：“图咏”自具旧京意象引发曹寅与遗民、新贵三者共鸣，唱和遂众；“图咏”最早实由曹寅亲绘“棟图”征咏而起，纳兰性德、尤侗以“甘棠”意象鼓吹之，咏歌基调遂定型；“图咏”主导精神指向曹寅内心深处的“江南记忆”，它是棟亭心史的精神底色。此举政治上默契地配合了清初康熙试图收服江南“士心”的决策；文学上，围绕“江南记忆”内在质素的递转，棟亭诗风渐由沉郁悲感趋向蕴藉风华，与之题咏的江南士人也同时完成了对晚明士风、诗风的嬗变与交接，“盛世雅音”再现。

**关键词** 棟亭图咏；曹寅；棟亭心史；诗风嬗变；江南交游

关于曹寅“棟亭图咏”的义涵，在启功和张伯驹同时及之后<sup>[1]</sup>，已多有论述，历来研究者讨论的观点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怀念先人、弘扬家风；二是以文会友，笼络江南遗民，配合清廷在江南的“统战”工作。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很笼统，文学事件既有一般“发生”的规律，又有具体的动态“过程”。按照蒋寅的说法，文学“史”的一般研究只能让人获得“结构的真实”<sup>[2]</sup>，距离细节的还原还差一大段距离。进入文学史的“过程”和“情景”中再来探析这一文事的发生、发展及后续影响，它并非只是对一般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历史事实的叙述，还包含着复杂的文学运动“过程”及因果关系之变迁。它既受历史大背景的引导，又受到文学“小环境”的左右，同时又与发起人曹寅的个人经历、性情、文学修养及幽微的情感心理有莫大关联。兹就此一文事，以追摹棟亭心史与一段清初文人心态，探索“棟亭图咏”背后的文化密码。

## 一 “棟亭图咏”与旧京意象

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朝灭亡已经40年，大批明遗民已凋零谢世，而以降服台湾郑氏势力为标志，在此前“三藩之乱”平定的基础上，清廷终于实现全国武力方面的统一。同在这一年六月，江

宁织造曹玺逝于金陵任上。这貌似毫不起眼的一件事，但由于其子曹寅紧接着以“棟亭图”遍征江南名家题咏，随后20余年陆续汇集了江南名流达70人左右（其中9人绘图）诗、词、赋作近70首<sup>[3]</sup>，不期然地演为清初江南文坛盛事。揆其历史节点，它正处于清廷政策由强硬转趋绥靖的大转向中，于是棟亭个人心史、江南士风与诗风嬗变轨迹遂借此呈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四卷《棟亭图》图册和散见于清人别集中的题咏诗可知，当时题咏作者众多，远不止今见人数。诗人身份构成既有新朝官员，又有旧朝遗民，并且有一大半（46人）来自江南<sup>[4]</sup>，可见曹寅邀题对象的指向性甚为明显，即江南一带的汉族文人士子。金陵作为明朝肇基之地，一直是经济、政治中心，于是“图咏”的诗客们遂不约而同借金陵曹家“棟亭”事题诗“言志”、传达心曲，而其中的“旧京（金陵）意象”，要是成为诸多身份不同的诗客们的情感勾连与牵系。

在“棟亭图咏”的诗客中，占籍金陵的明遗民诗人余怀堪为代表，其《寄题棟亭》诗道：“赏心亭子说秦淮，今日风流让署斋”，“谁咏君家华屋句，白杨风起恸西州”，落款“旧京余怀”。考秦淮河畔的“赏心亭”，实是宋人所建金陵胜迹，将这一咏歌对象放在清初特定时空背景之下，就有着固定

的内涵指向。早有学者论及，寻访宋人遗迹借景怀旧，其实是明末江南士人的经常性举动<sup>[5]</sup>，如钱谦益、柳如是即曾泛舟指点南宋古战场，怀想当日抗金英雄梁红玉。黄宗羲则将“身殉社稷”与“彷徨草泽”之宋末殉国者和遗民如文天祥、陆秀夫及谢翱、方凤、龚开、郑思肖一一标举<sup>[6]</sup>。面对“天崩地坼”，明遗民不由得拿“宋元意象”来比拟“明清鼎革”，借以寄托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历史悲情，对某一前朝旧居或生活氛围的追忆，遂被赋予了和一般场景不同的空间意义。面对“残山剩水”，诗人慨叹今日“风流”都被新朝江宁织造府棟亭主人所占据，其中易代之感则不经意地流淌。再如屈大均有《旧京感怀》诗，“燕雀湖空芳草长，胭脂井满落花肥”<sup>[7]</sup>，同样以追忆旧居、旧景玄武湖、胭脂井起兴，以草木亭台之荒芜写黍离之悲，以此基调再来观其《题棟亭诗》就能较为轻松地把握其心态了。诗云：“攀处栖乌满，啼时落月空。非因霜露冷，凄怆小亭东。”<sup>[8]</sup>“凄怆”二字，尤为明显地点出这一凄婉的情感色彩，非只倾诉棟亭主人一己的哀思。同一时空，叶燮《棟亭记》中也对金陵织造府有过这样的描述，“惟昔虞廷，职为汝明之官”；姜宸英《棟亭记》曰，“织造之职，设自前朝，咸领之中官，穷极纤巧……一代得失之由，非细故矣”。一开篇便溯其前明渊源，析究历史成败，这自然会牵惹起明遗民内心的波澜。晋室东渡，新亭诸君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之叹，严绳孙《棟亭诗》云：“闻道司空旧草亭，至今嘉树想仪型。分明一片棠阴在，遥对钟山万古青。”亦是将此“棟亭”故居放置在金陵城历史时空“大环境”中营构这一文学“小事件”。

要之，在清初特殊的背景下，类似“旧京某某”的落款、“金陵胜迹”的咏题、“江宁旧府”的溯源，实为怀念前朝不得已的“易代叙事”，题者对故国覆亡的隐痛之情透于纸背，经由一幅图而引发，有关诗歌意象群（芳草、棟树、落月、小亭等）遂统归于旧京意象之下，其主体象征内涵即遗民记忆。

由于题咏的诗客们并非全是遗民，还有仕清新贵，所以有关“棟亭图咏”旧京意象、旧京叙事内涵除了遗民记忆之外，还有另一种情感寄托。综合即此两端：一、故国之思；二、兴废之慨。二者兼

而容之。但严格来说，前者属于明遗民的感受，后者属于仕清新贵的视角。对前者而言，在故国之思的背景下更多是诗人对自身出处两难的叹息；对后者而言，古都金陵只是个符号，已成为想象，作为清朝生机勃勃的新世代，其慨叹只是诗歌酬唱范畴内的“怀古”。二者共同构成了图咏“金陵—棟亭”这一意象范式。正是由于“图咏”的发生地在金陵，以致其拥有这一先天自具的意象内涵，遂促使明清之际满清贵胥与汉族士人在文化对立与冲突之余找到了一个融合的端口。而棟亭主人曹寅与他们的历史交集，亦复通过这一空间意象勾连到一起。这场文事也才会和者如云，几乎囊括了当时文坛尤其是江南所有名流士大夫。

只不过，对发起人曹寅来说还有着不同于二者的第三种身份和情感，既不同于遗民之“隐痛”，又不同于新贵之“怀古”，作为清廷八旗上层人物的代表，其独特的精神心曲同样裹挟在旧京意象与旧京叙事之内，展现了第三种文本风格。结合曹寅本人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近7年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一情感以“棟亭图咏”为发端，饱含着他少年时代生活于斯地的江南故园的深深眷恋，夹杂着他对金陵的特殊情感和家族记忆，融合为特殊的情感关联即“金陵记忆”，更准确地说是“江南记忆”。从此以后，诸如“金陵”“江南”的意象不断出现在其诗文里，挥之不去。

## 二 棟亭心史与“甘棠”意象

考诸“棟亭图咏”中关于曹寅的旧京意象，最终指向其内心深处的隐秘情感记忆。其真相为何？以“棟亭图咏”为引线对曹寅文学交游做一个案考察，遂成为揭开棟亭心史——其心灵轨迹及精神底色的一把秘钥。兹从“棟亭”的姓字义涵，“棟亭图咏”文本生成缘起、主导内涵及精神底色四个层面，来诠释“棟亭图咏”的文本内涵，揭窠“江南记忆”的精神底蕴，以勾勒真实完整的棟亭心史。其中，“甘棠”意象的提出，昭示着“棟亭图咏”文本主导内涵与精神基调的最终定型。

（一）姓字义涵：“棟亭”或即“恋亭”隐语曹寅独特之心曲，在其安排好父亲丧事之后，

于年底即将要离开金陵前夕的赠友诗里,初露端倪。

本年底,由职务所限,曹寅做了一个月不到的“协理江南织造”即被撤差,由马桑格继任江宁织造,本人必须立刻返京回旗<sup>[9]</sup>。面对父亲的亡故、前程的渺茫未知,27岁的曹寅尝到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滋味。素来与其交契的叶藩作《望晴吟》安慰他,曹寅以《夜雨和叶桐初》诗作答:“血泪一秋阴,西风共此心。寒铎荒署满,秋蜡夜堂深。江海皆无限,家山不易寻。还伤投分友,空作《望晴吟》。”注云:“桐初作《望晴吟》,期予返也。”<sup>[10]</sup>此诗见诸《楝亭诗别集》,核心情感即其将要“永别家山”的伤感与绝望。若问曹寅在金陵治丧期间倡导“图咏”之缘起为何,要皆不能绕过对这一情愫的考量。不过历来研究者在诠释“楝亭”义涵及“楝亭图咏”的题咏动机时,都忽略了曹寅此年所遭受的心灵折磨,故而难以准确还原这一文事的发生。所谓纪念亡父功业云云,从逻辑进程上看只是结果,并非原因,更不是对“过程”的揭橥。

正是从此时开始,曹寅才以“楝亭”为号,以后也与“荔轩”并列成为其最常用、最有影响的字号。至于何以取号“楝亭”,曹寅本人及其友人的解释都与曹玺手植楝树,并于树旁营构一亭作为“课子”之所有关。当然今人的理解也大都未跳出樊笼。咀华涵咏,由于楝树并无特别的文化深意可与松、柏、梅、兰、竹、菊媲美,所以曹寅主观选择“楝树”以图征咏就必然有特殊的“象征”思考:一者当然与“如实”咏物有关,通过记录先君遗物、“刻画”门楣勋业;二即蕴涵着难于与他人言说的痛楚:楝亭谐音“恋亭”,暗示着在曹寅内心有着深刻的“恋亭”情结——“恋栈家园”,其名号“楝亭”的深意或在于此。应该说,曹寅这一“隐语”意象的创造未尝不是受到明遗民的深刻影响。不少学者业已指出,为避免清廷“文网之禁”,明遗民采取了独特的易代叙事语言,如用“朱”“红”“赤”“花”“落花”“江南”“金陵”等指称明朝,用“青”“边风”“朔雪”“燕山”“胡”“秦”等指代清朝<sup>[11]</sup>。又如屈大均《通州望海》诗“日月相吞吐”与《读史》诗“梦寐长依日月光”<sup>[12]</sup>;钱谦益《后秋兴》诗“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sup>[13]</sup>,用“日”“月”拆分以指明朝。王夫之《又雪》诗“连天朔雪悲明月”<sup>[14]</sup>,

顾炎武《流转》诗“弦月阴犹吐”<sup>[15]</sup>,以“日”“月”喻明。诸如此类,陈寅恪先生称之为“烟幕弹”者是也。余英时先生亦说:“以隐语传心曲,其风莫盛于明末清初。胜国遗民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道其事……于是隐语之系统出焉。”<sup>[16]</sup>要皆指此。

按之曹寅生平仕历,他从6岁起至18岁到京任职为止一直生长于旧都金陵,饫甘饜肥,鲜衣怒马地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金陵实为其第二故乡。可鲜有人能体会一个江南少年一旦离开故园时无限低落的心情,以至于对其心迹的把握始终雾里看花。曹寅生前刊定诗集《楝亭诗钞》八卷,而《楝亭诗别集》四卷实为“楝亭删诗者”<sup>[17]</sup>后为门人所刊定,曹寅有意删却之恐亦跟其中有“碍语”有关。例如《诗别集》中有怀马伯和诗云“长歌羨采薇”<sup>[18]</sup>及“义熙老尽江门柳”<sup>[19]</sup>,公开对一位江南故园的遗民,褒扬其气节,终有所不宜;今见有关“图咏”发起前后诗作及《放愁诗》等皆收在《诗别集》中,都可说明楝亭本人实有不得已的曲衷。故而周汝昌先生尝有楝亭诗“甚不易读”<sup>[20]</sup>之论。余英时先生曾就知人论世之学说道:“然未有不知人而真能论世者,更未有不知其心而真能知其人者。”<sup>[21]</sup>即是说对文史研究而言,若不去考察诗人心史而又想做到知人论世,几乎是镜花水月之谈。

就此而言,“楝亭”义涵与楝亭心史有关,即连“楝亭图咏”的生成缘起、演进过程、文学动态的流转,皆与之相关。迄今为止,研究者们也未能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与“情景”中来对这些问题梳理条贯,导致许多判断倒因为果。“楝亭”义涵如此,“图咏”缘起、发生亦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和个人心理因素在背后促动。检视、剖析清初文献,其实最早由曹寅本人亲绘楝图,随着征题浩繁,才有了后来“楝亭图咏”文本的最终生成。

(二)文本生成缘起:楝图最早由曹寅亲绘

据楝亭图卷可知,最早题诗的人一个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随康熙第一次南巡到金陵织造府中的纳兰性德,另一个是曹寅亲自寄去求题的苏州人尤侗。从这两人的最早题咏,可以看出“图咏”发生的来龙去脉。

纳兰性德所题是一首《满江红》,词曰:

籍甚平阳,羨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

山龙补袞，昔时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棟作三槐，趋庭外。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作暮。

词虽未标明时间，但结合第二年五月纳兰性德即逝的情况，则他与曹寅相见的机会只有本年十一月随康熙南巡期间<sup>[22]</sup>，因此这是最早的一首题唱诗。本年腊月，尤侗从北京回到苏州，收到曹寅亲自寄给他的“画册”，其诗前长序说道：

予在京师，于王阮亭祭酒座中，得识曹子荔轩。……孝子奔丧之后，寄予画册，阅之乃一棟树，司空所手植也……因题一律，以慰其蓼莪之思焉。

落款为“康熙甲子腊月吴门尤侗敬书”，可知尤侗题咏时间正在本年腊月，紧随纳兰之后。

令人注意的是，在纳兰性德和尤侗的记述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有一幅“图”的存在。纳兰性德词“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说明他本来就是对“图”题咏；而尤侗诗序说“寄予画册，阅之乃一棟树”又恰为佐证，证明在“图咏”最初确实是先有“图”后有“诗”。但是在历来的研究者包括张伯驹、启功先生的论述中，无一不说是曹寅在父亲逝后请人作图，再以图来征诗；至于请谁来作，作于何时，都不甚了了。今存画卷9人10图中最早留图者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画家程义，而最有名气的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继任苏州织造时为其绘图的禹之鼎。若依其说，待到征“图”之后再征“诗”，则又如何解释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四年（1685）、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690）之间，已经有一大批江南士人的题咏存在呢？向来无人留意的是，程义作图题诗，时在曹玺逝世后的次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其时已有这样的记述：

自此吾徒重风节，到处题诗寄冰雪；短轴长篇多至情，玕琅满眼如霏屑。

落款时间为“乙丑夏六月”，也就是说半年不到，“棟亭图咏”已经“玕琅满眼”蔚为大观了。而目前可以见到这段期间的诗仅有成德、顾贞观、张芳、尤侗4人之作，而大部分题作其实都是在六年之后即

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去苏州任织造时才征集到的，如何也谈不上“玕琅满眼”。联系到“棟亭图卷”在以后流传中不断遗失的情况，这半年里遗失的诗作自应不少<sup>[23]</sup>。恰巧今人在《国朝金陵诗征》里便辑到倪灿、方云旅两首题棟佚诗<sup>[24]</sup>，落款正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因此，这半年里遗失的肯定有一幅早期图，早于纳兰、尤侗二人。细品纳兰词“入梦凭将图绘写”，“入梦”“绘图”的主语自然是指曹寅本人了，此图自然是曹寅寄给尤侗的“画册”。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曹寅曾亲手绘作一图，然后才以“图”征诗。叶燮在《棟亭记》文中也明确说到曹寅“绘棟亭以为图，于先泽三致意焉”<sup>[25]</sup>，主语正是曹寅，亦为佐证。

进一步检阅《国朝金陵诗征》卷六那首散佚的倪灿《棟亭诗赠曹荔轩》诗里，诗前“小序”一段话也正印证了这一判断，终可揭开谜底：

棟亭者，完翁曹公之所构也。……数年以来，荔轩以才能入侍天子，不至棟亭者，凡几易春秋。今年夏，我公弃世，荔轩衔恤南来，抚高树之扶疏，见庭楹之犹昨，绘为画图，余为赋此以赠。<sup>[26]</sup>

又一次明确提到是曹寅“见庭楹之犹昨，绘为画图”。如此，“棟亭图咏”卷真正遗失的最为可惜的一卷图，正是曹寅本人亲手所绘棟图。

因此，“棟亭图咏”文本初步生成的真相乃是曹寅亲手作图，然后才以“图”征诗，由于士林递相引誉，应和遂众。可见它从一开始就非棟亭主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棟亭以簪缨世族自许，珍而重之的颇具仪式感意味的史事书写。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所谓“意识”是指人心中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曹寅正是通过某一时刻“自我意识”的觉醒才选择这样一个隆重的悼念方式，誓将父亲的功烈“刻画”流传。这就是其独特的“写作动机”。

（三）主导内涵：“司空棟”终被推扬至“召伯棠”的高度

《诗》云：“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曹寅既发起征咏，广求“友声”，挚友纳兰性德遂成为第一个囑和者，尤侗继之，皆在本年。必须指出的是，为了歌颂曹玺功业，纳兰性德《棟树记》和尤侗诗中共同开创了一个诗歌意象——“甘棠”，以至于

在随后的诗人题诗中皆以此为基调颂歌。纳兰性德《楝树记》开篇即以“召伯之棠”比兴设譬：“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以此言勉励之。尤侗诗亦道：“应攀惨柏哀王子，为拜甘棠忆召公。”这几乎成为“楝亭图咏”文本的精神主调。

所谓甘棠、召公棠者，按之诗典，《甘棠》乃是《诗经·召南》中的名篇，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这其实是一首老百姓怀念召公（伯）的作品。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治理政事，尝决狱于棠树之下，甚得民心，“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sup>[27]</sup>。从此，“甘棠”“召公棠”成为有德政的大臣之专称。继纳兰性德、尤侗用“甘棠”意象比附曹玺之后，咏歌基调定型，步和者如云。现据国图所藏之《楝亭图》录出如下：

顾彩题：“少日曾嬉槐棘荫，而今认作甘棠树。”袁瑄词：“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誉。羨手植，棠阴蔽芾。”程义诗：“君家楝树本棠树，后人能道前人恩。”费文伟跋诗：“一枝护甘棠，甘载梅花历。”高士奇诗：“温室亲移植，甘棠戒剪除。”王鸿绪诗：“束发诵三百，蔽芾南国棠。”严绳孙跋诗：“分明一片棠阴在，遥对钟山万古青。”徐秉义跋诗：“词客休为《楝树吟》，《召南》自有《甘棠》颂。”潘江诗：“勿剪真同召伯棠，攀条岂直金城柳。”潘义炳跋诗：“一树甘棠垂世泽，满筐文锦颯天威。”钱澄之诗：“岂如南国诗，徒美召公棠。”石经跋诗：“吾师（田间）为说棠阴盛，国干家桢迥出群。”韩茨跋诗：“棠梨自合千年在，不费花师着手留。”王士禛诗：“甘棠终忆召，大树尚留冯。”倪灿诗：“亭是传经扬子宅，树同亲植召公棠。”杜濬诗：“甘棠同勿剪，王长看孙枝。”秦松龄诗：“古人歌棠阴，嘉誉被百世。”张景伸诗：“春风万户怜棠荫，秋雨空墙护楝亭。”金依尧诗：“君不见莱公柏，召公棠，至今千载留清芳。”姚廷恺诗：“已并棠阴思雨露，还同秋水想蒹葭。”何炯跋文：“思榆社于栾公，咏《甘棠》于召伯。”杨雍建跋诗：“我亦有心歌盛事，诗成聊以寓甘棠。”方云旅诗：“名臣遗爱

珍花木，召公棠树莱公竹。”朱紫诗：“翠色萦窗香篆迟，亭成长忆树棠时。”

正如姜宸英跋文所说：“远近士大夫闻之，皆用文辞称述，比于甘棠之芟舍焉。”正所谓《诗》有“召公棠”，今有“司空楝”，继题的诗客们由“楝树”而联想到“甘棠”，进而将“司空楝”抬高到“莱公柏”“召公棠”的高度，正与曹寅本人所期望的“价值预设”不谋而合。因此，“甘棠”意象的拈出与题唱，奠定了“楝亭图咏”文本的全部基调。这一切既得益于士林的争相追捧，也得益于曹寅本人那副手绘“楝图”，更得益于纳兰性德、尤侗的意象“开创”之功。

不负初心，曹寅的愿望、精神向往顺利展开并如期达成，“客至皆题楝”“琅琅满眼”的题诗即是明证。星河斗转，曹玺以及江南曹氏一族的功业自会随着“图咏”的流传名扬四海，载于史册。

#### （四）楝亭心史的精神底色：“江南记忆”

“司空名德在千秋”，除了为纪念而外，若要完整描摹楝亭心史，始终离不开其隐秘情感的深刻烙印——“江南记忆”。曹寅从当初离开家园到回江南奔丧，这十年间难以忘怀的家族记忆与心灵痛楚，以及又延续了此后若许年，正是楝亭心史的核心，堪为其精神底色。其心结底蕴究是为何？抑或，单纯的思念故园之情能否将其情衷全部涵括？以意逆志，寻绎初心，答案依然是否。

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汝昌即曾指出顾景星与曹寅的舅甥关系——“燕台雅集，舅甥契谊”，但对此难以解释<sup>[28]</sup>。朱淡文则进一步指出，由于曹玺正妻孙氏为康熙保姆，曹寅出生时，二十七岁的她还远在皇宫不得放出，故而曹寅生母另有其人，即顾氏。曹寅真实出身应是“庶出”长子。因生母地位低下非正配，故而在曹、顾二人交往中均闪烁其词，“曹寅既非孙氏亲生，舅家又为顾姓，则其生母为顾氏可知”<sup>[29]</sup>。刘梦溪认为这一研究成果“在揭开谜底的道路上跃出了关键性的几步”<sup>[30]</sup>。近年来又有黄一农《曹寅乃顾景星之远房从甥考》等文章继续追索其间隐秘<sup>[31]</sup>，视野渐宽。这就促使人须重新看待明遗民与曹寅特别交好的个中原因，在遗老们看来曹寅是“自己人”，故而方能倾心相交。那么，曹寅既身为“庶出”，如何能在家族“竟

争”中最后胜出，继任父职呢？

惟再次回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语境，当时曹寅对未来并没有什么信心，康熙只是下旨命其“协理江南织造事务”，等丧事一了立刻撤差。对斯园的深切眷恋影响到曹寅一生的抉择，承袭父职、衣锦还乡几乎成为他灵魂深处的全部诉求。其于此亲绘棟图，发起“图咏”，取号“棟亭”，写《放愁诗》长篇以及纳兰性德的冀望、叶藩的安慰、杜芥的担忧，都与其艰难的家族处境有关。

面对“永别”，曹寅在临行北归前悲恸欲绝，写下《棟亭留别》诗：“客至皆题棟，从今有棟亭。……悠悠后来者，材否念居停。”<sup>[32]</sup>而首唱者纳兰性德十分准确地把握到曹寅此刻以图征诗的黯然心理，在《曹司空手植棟树记》中给予慰词：

余谓子清：“此即司空之甘棠也。惟周之初，召伯与元公、尚父并称，其后伯禽抗世子法，齐侯佞任虎贲，直宿卫，惟燕嗣不甚著。今我国家重世臣，异日者子清奉简书乘传而出，安知不建牙南服，踵武司空。……”

纳兰此《记》在《满江红》词前，其以“建牙南服，踵武司空”展望曹寅将来并期许之，隐然体察到曹寅在家族竞争中的艰难情状，适为安慰他彼时低落心情的一剂良药。再从“客至皆题棟”一句可知，跟随纳兰南来的不少友人在此时为“棟亭图”赋诗填词（顾贞观等），曹寅似乎只有在“题棟”诸君那里才会获得一丝安慰。

次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五月，曹寅扶柩回京，“黄冈二杜”之一的杜芥来送行，赠以长诗《思贤篇》，以公子季札、曹植比之：

昔有吴公子，历聘游上国。……又有魏陈思，肃诏苦行役。翩翩雍丘王，恐惧承明谒。  
《种葛》见深衷，《驱车》吐肝膈。古来此二贤，流传著史册。曹子在金陵，游宦同世籍。言非父母邦，眷恋朋友契。读书二十载，与我倾盖立……。<sup>[33]</sup>

季札以逃隐让国，曹植受封“雍丘王”退出储位之争，作为与曹寅最为相契的“好友”“同学”，杜芥这时用这两个典故来比拟曹寅，当然有“历史映像”做观照。杜芥同样是察觉到曹寅与二弟曹宣在家族竞争中不得不兄弟反目的痛苦处境，所以有感

而发。曹寅虽是长子，但曹宣才是正室孙氏所出，在家族继承人之争上曹寅可说是孤立无援<sup>[34]</sup>。杜芥诗中用典如曹植《种葛》篇本就是写兄弟不和的苦闷，而《驱车》篇吐露的“肝膈”即是要登泰山求仙以为解脱。朱淡文曾就此推断：“大约当时家庭矛盾尖锐，曹寅伤心之余，曾萌出世之想。其详情虽不可知，总是与争夺织造肥缺及家庭财产继承权有关。”康熙二十三年（1684）曹寅一系列《放愁诗》亦告诉人们，这一哀愁并非“父丧”那么简单。

康熙二十八年（1689），杜芥再为曹寅《舟中吟》作序，诗序中又一次提到曹植：

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闾阖，羨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昔人品诗，谓建安、齐梁诸才人皆有君子之心焉。请以相曹子，庶几孟氏诵诗知人之旨。<sup>[35]</sup>

杜序说“荔轩之心”即陈思王之心，究竟何谓“陈思之心”？周汝昌独认为即“臣汉之心”<sup>[36]</sup>。不过现在来看，曹寅心中满怀对兄弟不和的伤悲以及前途无望的悲哀，才是他真正的现实困境。而杜芥所谓“荔轩之心”即“君子之心”，指向曹寅既不堪在家族嫡庶之争中与兄弟“参商”又不甘庸碌一生的两难之情。为摆脱这种愤懑，征咏于汉族遗民、士林，不但成为其情感的外化，更成为其求友、求赏音最好的寄托。有学者业已指出，曹寅广为征咏实质上有着希望自身令名远播的动机<sup>[37]</sup>。不得不说，以结果来反推棟亭当时“用心”实有“诛心”嫌疑。“孝悌”的观念根植在心，不止是形式。探秘棟亭心曲，不论名曰“荔轩之心”还是“君子之心”，其精神内涵最终都只能从这一充满现实困境与故园情愫的“江南记忆”温情底色入手。归纳其内蕴，可知它至少涵括两层义涵：一是纠结于家族矛盾、“鹤鹑之悲”的痛苦愤懑；二是对江南故园的眷恋及重返江南承袭父职、建功立业的渴望。“图咏”卷一有桐城方仲舒《题棟亭诗》，可说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图卷主人两种情感的纠结，也映衬着棟亭彼时“自我意识”觉醒下两难的身份选择：

思亲交好访幽逸，爱弟策励忘寒暄。

孝友文章棟亭里，宁俟建立声名喧。

想二者得兼何其难也！康熙二十九年（1690）曹寅甫到苏州即有和杜芥诗《和些山冬至前三日咏东轩

竹见寄》道：“玉管殷勤记楝亭，谁将遗恨洗空青。七年墨沈文光动，一半秋生俗耳听。”<sup>[38]</sup>此诗真意，于此方得。“七年墨沈”云云，并非笺注者所说是二人交往时限的叙写，“七年”是时间，“墨沈”是空间，指向“图咏”缘起之金陵时、地，实则正是曹寅对自身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挟“楝亭图”北上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终回江南“七年之期”的痛苦历程——逆袭凯旋的大总结、长叹息<sup>[39]</sup>。

于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再来叩问“楝亭图咏”的意义，一者说“纪念”，一者说“统战”，二说都流于史实的碎片化。当时的曹寅并没有“统战”的实力；同时，纪念勋业、表达孝思也并不能涵括其全部意义。事实上，“楝亭图咏”文本的产生与生成，承载着楝亭主人于早期竞起风云之际不得已的曲衷以及不屈不挠的凌云壮志。既有无奈，又务必前行。最终，前一层义涵通过与友人诗而明确传达，后一层底蕴则通过持续营构“楝亭题咏”文事更加清晰地呈现。重返江南，“踵武司空”，已成为曹寅本时期所有烦忧纠结所在。退一步说，即使有“统战”的嫌疑，也只是“图咏”后期衍生的结果。

### 三 “江南记忆”与诗风嬗变

楝亭诗之艺术成就，可谓“苍凉沉郁，自成一派”<sup>[40]</sup>，之所以在后世冷落不名，不但跟曹寅生前大量“删诗”、死后家族被抄有关，也与周汝昌所论“甚不易读”有关。若论其诗风，曹寅自言“吾宗诗渊源，大率过清腴”，以“三曹”为宗<sup>[41]</sup>。顾昌在《楝亭诗别集》序中评价楝亭诗风经历了四种变化：“由风华而峭蒨，由峭蒨而精深，今则将归平淡矣。”<sup>[42]</sup>似已定评。若对楝亭一生诗歌生涯做整体观照，则其早期的经历与诗歌创作依然被学界所忽略。易言之，楝亭诗风在“由风华而峭蒨”之前，还有一段“沉郁”的过往。结合后期的诗歌创作来看，楝亭诗风演进转接前后变化十分明显，围绕“江南记忆”这一内在质素截然两判。

评鉴楝亭诗风，以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职苏州织造为界分前后两期，楝亭诗风为之一变：前期身居京城多为思乡（金陵）之情，诗风沉郁悲感；后期回到江南，多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情感昂

扬向上，渐趋“风华”。前者诠释了他“楝亭之思”的情感依托所在，后者则跟他秉节江南，肆力于营造江南一带文化、政治功业的现实关怀有关。整体上看，“江南记忆”的情感色彩在其诗文中始终贯穿。

且看楝亭前期诗作，主要见于《楝亭诗钞》第一卷及《诗别集》第一、第二卷，充满了对江南、对家人的怀念，以及对秦淮故旧的追忆，个中刻骨铭心之感时时见诸笔端。诸如《宿来青阁》：“愁人遍听荒鸡唱，烽火无边归梦中。”《梦春曲》：“鸿雁归矣可奈何……碧尽江南一江水。”《人日和子猷二弟》：“草魂未返江南梦，雁字初归人日晴。”《雪霁次些山韵》：“十日归鸿迷建业，万行疏柳梦长安。”《临清闸听水》：“一悟浮生灯影是，弹冠犹惜故乡尘。”《九月十五夜与阿蒙朴仙啸亭酌月》：“若到故园秋草在，寒潮应念石头城。”《旅壁书感》：“最惜江南呼酒处，柳花如雪听莺时。”《春日感怀》：“零乱故园飘艳雪……伤心人醒扬州梦。”《登喜峰城》：“貂裘自顾增羞涩，明月天涯有敝庐。”《恒河》：“五年不梦长江水……今夜天涯何处归。”《读梅耦长西山诗》：“我颂残春篇，慨焉叹行役。”《赵北口》：“回身感旅宦，辕辙何时休。”《西苑晴二首》：“迟迟故园信，凄恻忆缝裳。”<sup>[43]</sup>以及，由此生发的刚至京城当差的不适感、失落感亦伴随其中。《楝亭集》这一时期的诗作同时充斥着大量类如“尘役苦无厌”“慨焉叹行役”“回身感旅宦，辕辙何时休”的出世之作，与纳兰性德《饮水词》可谓同一悲感，莫不与其沉沦下尘的心境有关。周汝昌在评《恒河》《登喜峰城》诗时说这是曹寅“归乡恋故的思绪”<sup>[44]</sup>，殊不知真相乃在此。父亲去世，曹寅更加感到绝望，返回金陵安排好丧事，次年又怀着悲痛的心情匆匆北上，在京城遇见好友叶藩不禁痛哭，“坐来翻洒伤心泪，四月孤亭楝影浓”。紧接着知交纳兰性德又离世，一连串打击，迫使曹寅越发感到寂寥、悲感，归隐之心愈浓。

岁月流转，京城的繁华还是一点点影响到曹寅内心的变化，在接下来的6年，随着他在京城地位一天天上升，开始摆脱颓丧心怀融入到京师文人的生活圈中。他主动交识江南遗民，加入“淶水亭文会”“己未文会”及王阮亭酒会，其诗文中强烈的

思乡、归隐的“江南记忆”也开始慢慢转淡，消融在京师的喧阗之中。最终在康熙的有意“栽培”下，曹寅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被任命为苏州织造，从此平步青云。值此身处江南，多年以来“衣锦还乡”的心愿渐次达成，其心境为之一变，诗风亦随之而变。前期诗文中对江南的怀念、梦呓一变而为歌颂、赞美。诗文中持续不断地出现的江南意象与情结，遂成为其“江南记忆”情感的持续发酵。

之后的诗作，透露出一改往日颓丧的心怀。诸如《渔村》：“麦熟午风轻，轻舟信水行。”《移竹东轩和高竹窗学士来韵》：“移来槛外深相似，早有清风拂绮罗。”《月夜舟泊惠山过秦园》：“池影低枝多宿鸟，月明此处却闻泉。”《题云辨上人小册》：“南桁不是无车马，老树匡床只恋家。”《归舟口号和宋中丞》：“长游无一事，三月下扬州。”《江阁晓起对金山》：“淮海维扬衽席间，卧游终日似家山。”《和乔俊三东村书屋诗》：“不识城东角里村，意中流水绿当门。”《六月廿五日大雨同鹿墟、九迪、子鱼》：“扬州无百里，一舸溯秋程。”<sup>[45]</sup>以及辑自《不下带编》诗：“赚得红蕖刚半熟，不知残梦在扬州。”<sup>[46]</sup>即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之后，曹寅心境彻底发生改变，之前倦于仕宦的沉闷情绪一扫而空，代之以希图建功立业的强烈自信心与壮志豪情。正如《十三夜南楼看月》诗：一边欣赏江南水乡月色“水乡月色真娟纱，独夜东吴静赏偏”，一边关注北方战事“直北再瞻兵气劲，龙沙早雪是今年”<sup>[47]</sup>。同时，在官务之暇，又能自得其乐。初至苏州即泛舟至娄门渔村行乐，并与幕僚至虎丘酬唱。在棟亭以后的诗中，也渐渐披露出旷达、惬意的一面。可以说，在重回江南的数年中，曹寅诗中一方面展现了他积极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一方面又展现了在官务之暇惬意游乐、诗文酬唱的风雅日常。随着日后仕宦江宁、扬州时期政务繁忙，加上亲旧朋辈的逐渐凋零，其身心越来越觉疲惫沉重；但唯一不变的是其诗中的“江南情结”始终缭绕不绝。翻开《棟亭集》，这一时段的他时而泛舟虎丘、太湖；时而饮泉惠山；时而于扬州“闲坐谱琼箫”；时而在燕子矶“徘徊不能去”，诸多江南意象频繁出现在《棟亭集》中。这一“江南记忆”，永远地烙印在了棟亭内心深处。

要之，以“图咏”事件为表征，不但棟亭本人诗风产生了变化，题咏的诗人词客们的笔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固有的“华夷之变”观念松动，“润色鸿业”的“集体无意识”气韵渐渐流淌于笔尖卷端。即如遗民诗客屈大均、陈恭尹、钱澄之、查士标、潘江、余怀、杜芥、杜濬、恽寿平、倪灿、邓汉仪以及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而留题棟亭者如严绳孙、秦松龄、毛奇龄、徐乾学、姜宸英等人，皆在新时代的生涯中完成了属于自我的救赎。

比如屈大均早年曾“取永历钱一枚，以黄丝系之”以示不忘故国，桂王西撤，乃以逃禅避祸，还曾与陈恭尹一道亲与三藩之乱，出谋划策<sup>[48]</sup>。其《翁山诗外》保存了如今散佚的《题棟亭诗》，相比前期的决绝，如今能从容题诗于卷段。这自然是由于到了后期随着社会日趋安定，他开始对自身十年“逃禅”经历进行了反思，昔者逃禅而“今之归也，行儒之行，而言儒者之言”<sup>[49]</sup>。像他这样的明遗民纷纷走上了弃僧归儒的道路，与新贵们的交往亦能心态平和。钱澄之，明亡后立志抗清，失败后“归老江村”，复明之念虽毫无断绝，但态度也渐渐发生明显松动。其《正统论》即提出政权之正闰“一以人心断之”<sup>[50]</sup>，以人心之向背而不再以“夷夏”观念去衡量政权性质，前后思想明显不同。其所赋《棟亭诗织造曹子清索题》云：“孝思既以著，先德亦以彰。岂如南国诗，徒美召公棠。”<sup>[51]</sup>肃穆雅音，俨然治世心怀，堪为其心态变动的又一佐证。余怀，国变前混迹秦淮河畔，“过江风流，应复推为领袖”<sup>[52]</sup>。国变后四处浪游，将亡国之痛寄情山水之中，诗风一变。但到了康熙年间，隐居苏州的他已经渐渐融入新朝时光里，诗风清贍，绮而不靡，在与曹寅的交往中亦能倾心相交，并寻求文学上的“声传后世”。吴之振在《题曹子清工部棟亭图》诗中提到有位“查老”——“册中查老诗书画，三绝今堪比郑虔”<sup>[53]</sup>，今已散佚。此人即查士标，字二瞻，安徽人，流寓扬州。查士标入清不仕，书画师承董其昌，与江南画坛和文坛不少名流结交。早期笔墨风神懒散，气韵荒寒，后期行云流水，气韵高华，亦跟其交游日众相互切磋有关。叶燮，入清曾仕宦，后罢官归隐，游历山川，结识了曹寅、朱彝尊、梁佩兰、吴之振、王士禛等，使他对当时



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由于对当时诗坛盛行刻板的摹拟和复古之风不满，叶燮有意矫正诗坛流弊，而曹寅等人主情志、不拘“唐”“宋”的诗学思想都会对他撰写《原诗》时的诗学思想产生影响。王士禛还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sup>[54]</sup>。潘江，入清不仕，布衣终身，却长期主盟桐城文坛，对桐城文坛影响广泛，其《楝亭题诗》“楝兮行且庇九州，亭兮行且垂千秋”，亦不无溢美之词。

概言之，无论遗民、新贵，诗人、词客，画家、隐逸，经由一幅图而勾连，借“题咏”一役，江南士风、士心遂得以动态化地坦露。“楝亭图咏”前后持续时间之久，辐射人员之广，成为清初文学与政治相互发生关系与影响的标志性事件。随着“唱和”范围的扩大，江南文坛随之发生整体变动，士人心态、诗文风格亦因之发生整体变革。

## 结 论

对于曹寅其人的研究，前人都将目光锁定在他任职江宁织造“拉拢”江南遗民和修纂《全唐诗》这两件事上。殊不知，“楝亭图咏”作为他人人生事功的起点，不论是从清初史实的剥茧、辨析上，还是从文学交游的谱系勾连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加上“图咏”的后续延伸到随后20余年，“图咏”更成为其人生事功的见证者。曹寅再次回到北京并在7年之后重回江南这期间，由其倡导的“楝亭图咏”无疑是他早期人生事功里最出色的一笔。由于他超额完成了“投名状”，这才最终赢得康熙的赏识；或正如论者所说，康熙才不惜以帝王之尊，亲自插手干预曹家族长继承人的决定权<sup>[55]</sup>。又三年，曹寅最终移镇江宁织造，曲线逆袭。随着“楝亭图咏”的持续发酵，曹寅不但为自己积累了良好的士林清誉，还默契地配合了康熙平定武功之后崇道右文、试图收服江南“士心”的基本国策；同时，其诗风亦渐由沉郁悲感趋向蕴藉风华，适时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这为其日后主盟江南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与之题唱的江南士人们也同时完成了对晚明士风、诗风的嬗变与交接，“盛世雅音”再现。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曹寅在未来20余年江南仕宦生涯中一直“圣眷优渥”，连续数次接驾皇帝

南巡，成为总纂官编修《全唐诗》《佩文韵府》，都与其早期的政治积累与个人魅力有莫大关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曹寅与清初江南文人交游研究”（项目编号15CZW035）阶段性成果]

[1] 参见少文：《记楝亭图咏卷》，《文物》1963年第6期。

[2] 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见《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据《国朝金陵诗徵》卷十二王奕鸣《楝亭诗赠曹子清通政》、朱紫《楝亭诗赠曹子清通政》等佚诗，可知是曹寅做通政使时所题赠，而曹寅加封通政使司銜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见本年闰四月初五日曹寅奏折），距离康熙二十三年（1684）已是20年之后了。至于人数和诗赋数目，据国图所藏图咏四卷，共有诗赋50篇，人数55人；又今人（周汝昌、胡文彬等）辑佚出另有14人诗赋14篇，合言之，今可知至少有69位诗人画家，留题64篇诗（词）赋。

[4] 据薛龙春《楝亭图咏卷的作者、诗画与书法》（《美术研究》2017年第5期）一文统计，从地域来源看，9名画家有5名来自江苏，1名寓居扬州，其余诗文作者江苏31人，安徽11人，浙江11人，广东3人，山东1人，北京3人。由于清初安徽和江苏一度共属江南，广义来说，应将二者合一，那么属于江南的士人画家就达46人。

[5] 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27页，三联书店2010年版。

[6] 参见黄宗羲：《余恭人传》，见《黄宗羲全集》第19册，第2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7] 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2册，第8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8] [12] 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1册，第482页，第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9] [37] [46] 方晓伟：《曹寅评传·年谱》，第318页，第246页，第559页，广陵书社2010年版。

[10] [17] [18] [19] [32] [35] [38] [42] [47] 曹寅著：《楝亭集笺注》，胡绍棠笺注，第444页，第372页，第440页，第390页，第443—444页，第4页，第459页，第371页，第6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11] 参见朱则杰：《清代诗歌中的一组特殊意象》，《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

[13]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第7册，第73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14] 王夫之:《船山先生诗稿》,《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3 册,第 45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15] 顾炎武著:《顾亭林先生诗笺注》,徐嘉笺注,《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2 册,第 19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16] [21]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自序”,第 4 页,第 5 页,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20] [44] 周汝昌:《曹寅诗考略》,载王晓宁:《学海星光集》,第 306 页,第 309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22] 亦可参见张一民:《纳兰性德为曹寅题跋〈棟亭图卷〉的时间》,《红楼》2004 年第 2 期。

[23] 关于图卷的形制、初装与流传中改装情形,详见李军:《曹氏家藏〈棟亭图咏〉卷佚诗考——兼论该书流传改装问题》,《曹雪芹研究》2017 年第 1 期。

[24] [26] 在朱绪曾等辑《国朝金陵诗征》中,卷六收倪灿《棟亭诗赠曹荔轩》,卷九收方云旅《题曹子清棟亭》,清光绪刻本。

[25] 叶燮:《已畦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44 册,第 51 页,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27] 司马迁:《史记》,第 271 页,岳麓书社 1988 年版。

[28]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 325 页,棠棣出版社 1953 年版。

[29] [55] 朱淡文:《曹寅小考》,《红楼梦学刊》1982 年第 3 期。

[30]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 124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31] 参见黄一农:《曹寅乃顾景星之远房从甥考》,《文学遗产》2012 年第 6 期。

[33] 杜芥:《些山集辑》卷二,王葆心辑,民国汪氏重刊本。

[34] 参见朱志远:《曹寅“子嗣甚艰”再论——从〈朴村集〉看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及其忧患意识》,《中国诗学》

第 23 辑,2017 年 10 月。

[36] 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五)》,《光明日报》,1962 年 6 月 2 日。

[39] 据《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致户部的咨文》,康熙二十九年(1690),诏画《南巡图》,命曹宣(荃)“监画”,知曹宣时在京任内务府侍卫。参见张叔才、高振田:《新发现的一件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红楼梦学刊》1984 年第 1 期。

[40] 尤侗著:《尤侗集》下册,杨旭辉点校,第 135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

[41] 纪昀等评价曰“出入于白居易、苏轼间”,要非正评,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 5006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43] [45] 引《诗钞》及《诗别集》诗作,见曹寅著:《棟亭集笺注》,胡绍棠笺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年版。

[48] 参见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第 291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49] 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 3 册,12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0] 钱澄之著:《田间文集》,彭君华校点,第 47 页,黄山书社 1998 年版。

[51] 钱澄之著:《田间诗集》,诸伟奇校点,第 574 页,黄山书社 1998 年版。

[52] 徐钊:《本事诗》卷十一,见杜松柏主编:《清诗话访佚初编》第 1 册,第 483 页,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7 年版。

[53] 吴之振:《黄叶村庄诗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37 册,第 763 页,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54] 沈德潜《归愚文钞》卷十六《叶先生传》:“先生既卒,新城王尚书阮亭寓书,谓先生诗古文熔铸古昔,而自成一言之言。”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35 册,第 2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马勤勤